

# 蘇共二十大後中共對德國 統一社會黨的影響探析

• 葛 君

**摘要：**1956年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後，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思想主張對德國統一社會黨的影響經歷了一個複雜的變化過程。赫魯曉夫(Никита С. Хрущёв)的「秘密報告」讓德國統一社會黨內領導人在如何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問題上產生了分歧，但他們都一致讚賞毛澤東提出的「以蘇為鑒」、走符合本國實際的社會主義道路的見解。而毛澤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更是得到了德國統一社會黨黨內「改革派」領導人的熱烈響應，他們想藉此口號實現更大程度的黨內民主，這威脅到第一書記烏布利希(Walter Ulbricht)的個人權威。「波匈事件」的爆發緩解了烏布利希的壓力，尤其是毛澤東對於匈牙利事件的態度間接地維護了其領導地位。不過中共之後開展的整風運動又給他造成新的壓力，直到中共從整風轉向反右之後，才讓烏布利希感到自己「誤會」了毛澤東，也隨之開始着手打擊「改革派」。

**關鍵詞：**蘇共二十大 中共八大 德國統一社會黨 烏布利希(Walter Ulbricht)  
「雙百」方針

1956年2月14至25日召開的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在各個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方針：在國際方面，完整地提出「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平競賽」的總路線（「三和路線」）；在國內方面，提出了一些旨在改變經濟發展及管理體制的措施。此外，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Никита С. Хрущёв)還發表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批判長期以來對斯大林的個人崇

\* 本文係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青年課題「冷戰時期東、西德對華關係研究(1949-1989)」(項目號：2018EL002)階段性成果，感謝匿名外審專家對本文所提出的修改意見。

拜，並提出要加強黨內的集體領導<sup>①</sup>。這次會議在蘇共歷史上具有極其特殊的意義，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及各個社會主義國家也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在一段時間內動搖了各國共產黨的政治觀念及其意識形態基礎。

中蘇關係史研究中的傳統觀點認為，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蘇共二十大一開始就持基本否定的立場，因此提出蘇共二十大是中蘇兩黨走向分裂的起點。然而，通過沈志華的研究可以發現，中國共產黨隨後召開的全國第八次代表大會與蘇共二十大不僅在時間上是連續銜接的，而且在思想認識、方針政策以及發展路線等各方面，也都是一致的。所以，此時的中蘇關係並沒有被削弱，反而是得到了加強<sup>②</sup>。但是這一學術觀點似乎並沒有完全被研究中國與民主德國（東德，全稱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關係的西方學者所注意和採納。施圖貝爾（Nicole Stuber）在討論蘇共二十大後的中德關係時指出，此時民主德國領導人對於中蘇關係的惡化不為所動，並沒有因此調整對華政策，展現出某種「特立獨行」<sup>③</sup>。研究蘇聯與民主德國關係的哈里森（Hope M. Harrison）則認為，中共對蘇共二十大的態度與德國統一社會黨（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 SED，以下簡稱「統社黨」）第一書記烏布利希（Walter Ulbricht）的立場相似，毛澤東對赫魯曉夫在批判斯大林以及在內外政策改革上的指責，對烏布利希努力抵禦赫魯曉夫的改革呼聲起着很大的幫助作用<sup>④</sup>。這些觀點其實都是將蘇共二十大視作中蘇關係惡化的起點，認為自此之後中蘇兩黨已經走上兩條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從而使得對蘇共二十大同樣持懷疑態度的烏布利希通過靠攏中共來反對黨內非斯大林化的呼聲。

對於中德兩黨的領導人而言，蘇共二十大無疑對他們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那麼他們到底是如何應對的？烏布利希對於蘇共二十大的看法和毛澤東相比到底有甚麼不同？特別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這一時期所提出的一些思想主張對德國統社黨到底產生了何種程度的影響？本文試圖利用中德雙方的檔案文獻，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館、德國聯邦檔案館民主德國政黨與群眾組織分館（Stiftung Archiv der Parteien und Massenorganisationen der DDR im Bundesarchiv, SAPMO-BArch）檔案，以及沈志華、哈里森等學者的相關研究，對以上問題進行回答，意圖揭示在蘇共二十大之後，中德兩黨並未像西方學者所認為的那樣聯合起來共同反對蘇共二十大，毛澤東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雙百」方針）甚至一度成為德國統社黨內部分歧的一個重要因素，對於烏布利希造成了不小的困擾，這個困擾直到中國在1957年開展反右運動之後才得以消除。

## 一 蘇共二十大後德國統一社會黨內的分歧

蘇共二十大所提出的新方針，特別是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反對個人崇拜的秘密報告，對德國統社黨領導層造成了巨大的衝擊。尤其是對於黨內一把手烏布利希的態度，研究者似乎形成了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在蘇共二十大結束之後烏布利希就迫不及待地公開發表文章讚揚和吹捧蘇共的新精神<sup>⑤</sup>。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烏布利希對蘇共二十大，尤其是對秘密報

告並不支持，並且有意拖延黨內就有關蘇共二十大新精神的傳達與討論<sup>⑥</sup>。那麼到底確實情況如何呢？

1956年2月26日凌晨3點，當時正在莫斯科、剛參加完蘇共二十大的德國統社黨代表團成員從睡夢中被喚醒，要求派代表前去聆聽有關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通報，政治局委員席爾德萬(Karl Schirdewan)受委派作為代表，聽取秘密報告內容並作了記錄。當他返回代表團駐地向同事報告了相關內容之後，與會代表就已經在如何看待和評價秘密報告這個問題上出現分歧<sup>⑦</sup>。

德國統社黨代表團回到柏林後，政治局成員於2月29日在黨主席皮克(Wilhelm Pieck)的住所內召開了一次特別會議，烏布利希在會上就蘇共二十大的情況作了報告。從當天的政治局會議記錄來看，會議決定把對蘇共二十大的評價與即將召開的第三屆代表會議<sup>⑧</sup>的準備工作結合起來，發表有關蘇共二十大的指導性文章，同時在各項會議上作有關蘇共二十大的報告<sup>⑨</sup>。在政治局的決議當中並未反映出領導層內部的矛盾，但是根據席爾德萬的回憶，與會人員在對待赫魯曉夫批判個人崇拜的態度上出現了分歧，主要集中在一個問題上，即究竟應該把斯大林的錯誤歸咎於他的個人秉性，還是應歸咎於社會主義的制度缺陷<sup>⑩</sup>？

3月4日，烏布利希在《新德意志報》(*Neues Deutschland*)上發表了一篇署名文章，高度評價蘇共二十大並突出其重要性，但在涉及批判個人崇拜的問題上做了模糊化處理，仍然只是堅稱「斯大林不能被算作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可見烏布利希個人似乎並不希望在黨內立即開展對斯大林以往所犯錯誤以及個人崇拜問題的討論；關於蘇共二十大具體的細節與內容，甚至連黨內的中央委員都不甚了解，烏布利希有故意拖延向黨內傳達蘇共二十大會議精神的嫌疑<sup>⑪</sup>。

即便烏布利希想要在文章中淡化大眾對批判斯大林的關注，但是在文章發表後仍然激發了民主德國普通群眾的熱烈討論，無一例外地都集中在斯大林問題上。因為對於普通群眾而言，那位迄今為止一直說斯大林好話的烏布利希同志，現在卻表達出完全不同的看法，這件事本身就值得注意。對此，黨員和普通群眾表達出各種各樣的觀點：有人質疑，為甚麼對斯大林的批判會在他死後才出現？有人提出，如果說斯大林算不上經典作家，那麼他寫了那麼多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又算甚麼呢？有人表示，必須發表一個徹底批判斯大林的聲明，是時候在民主德國貫徹集體領導原則並清除個人崇拜了<sup>⑫</sup>。面對風起雲湧的大討論，黨內領導層對於蘇共二十大和秘密報告卻仍然諱莫如深，這種情況自然引發了黨內中層領導的不滿。

3月7日，德國統社黨中央委員文策爾(Otto Winzer)直接致信烏布利希，表示包括他在內的一些中央委員都希望能夠召開一次中央全會，對蘇共二十大的情況作徹底、全面的了解，並以其結論為指導，對即將召開的第三屆代表會議的主要問題作徹底討論。值得注意的是，文策爾對於自己即將前往蘇爾(Suhl)參加區委會議，但卻尚未全面了解蘇共二十大感到十分擔憂，他在信中寫道：「我明天還將去蘇爾參加區委會議，在那裏可能還會作為中央委員會的代表講話，因而我感到尷尬，或許區委的領導同志以及與會的黨中央機關的工作人員都比我知道得更多。許多中央委員都處於同樣尷尬的境地，本

來這些天他們在各自部委及企業的黨組會議之前，都應該談談有關蘇共二十大的情況。這一情況或許並不符合列寧標準下的黨的生活。」<sup>⑬</sup>

次日，烏布利希回信表示會盡快向所有同志公開蘇共二十大的報告；德國統社黨代表團從蘇共中央主席團處得到的全部會議材料，將會在第三屆代表會議召開前分發給所有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烏布利希同時承認，有必要在第三屆代表會議上對蘇共二十大的一系列決議進行討論。他告訴文策爾，政治局已經開始着手會議的準備工作，並且會在此之前召開中央全會。第三屆代表會議的所有文件都會提交中央全會討論，並保證這不只是一次例行公事的走過場，而將會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sup>⑭</sup>。烏布利希同時將文策爾的來信和他的回信抄送所有政治局委員，建議在政治局內對文策爾的信件內容進行表態<sup>⑮</sup>。

如果仔細琢磨烏布利希的回信內容，可以基本確定的是，他對於是否在黨內公開赫魯曉夫秘密報告這個問題上仍然是有所保留的，由於秘密報告的內容是由蘇共中央向德國統社黨代表團進行口授，並不在分發給與會代表團的會議材料之列，因此，即便在之後召開的中央全會上公開所有關於蘇共二十大的會議材料，其中也並不會包含秘密報告。

可是紙終究包不住火。3月17日，倫敦和西柏林的報紙開始相繼出現有關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報導，並且還刊登了報告的部分內容。德國統社黨政治局對此立即作出反應，決定讓烏布利希在柏林區委代表會議上就秘密報告中的一些問題進行回應和解釋。在這次會議上，烏布利希提到了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問題以及由此造成的錯誤，並強調德國統社黨也必須剷除個人崇拜所引發的錯誤<sup>⑯</sup>。

然而，在《真理報》(Правда)尚未正式表態之前，由烏布利希率先評價斯大林問題並予以公開報導，這對習慣於唯蘇共馬首是瞻的德國統社黨來說，感到非常不恰當。因此，它需要馬上就這個問題同蘇共中央進行溝通。3月19日，烏布利希致電報予赫魯曉夫，向他說明情況<sup>⑰</sup>：

我們必須想到，敵人會基於倫敦發表的東西，繼續通過廣播擴大其活動。出於這一原因，參加柏林區委代表會議的德國統社黨政治局委員一致同意，認為我在討論會上所持的立場，尤其涉及斯大林問題的立場，在黨內起到很大的作用。按規定，這些討論發言應該馬上予以發表。而在《真理報》表態之前，我們就對蘇共的問題公開表達立場，這並不讓人高興。但在這種形勢下，我們別無選擇。我建議，《真理報》發表一篇社論，就一些問題表達立場。

至此似乎仍然不可妄加揣測烏布利希內心的真實想法，他是否真的將秘密報告當成潘朵拉的魔盒？可是木已成舟，西方媒體率先公布了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內容，使他不得不去直面它們。最終的結果是，德國統社黨領導層得到了蘇共的正式許可，可以將秘密報告文本分發黨內。烏布利希也遵守了他在給文策爾回信中作出的承諾，3月22日，德國統社黨中央召開二十六中全會<sup>⑱</sup>，席爾德萬在會議上向全體中央委員報告了有關秘密報告的內容<sup>⑲</sup>。烏布利希

在對全體中央委員的講話中，正式表達自己對蘇共二十大的看法，至少從這個講話中可以看出，他對於蘇共二十大的態度是有所取捨的。首先，他批評了一些黨內領導同志並沒有認真閱讀赫魯曉夫的報告和蘇共二十大的決議，只關心蘇共領導人米高揚（Анастас И. Микоян）批評斯大林的發言<sup>20</sup>，卻不關心會議本身所回答的新的理論問題及其對於德國統社黨當前工作的重要意義，把目光過於集中在批判斯大林的個人錯誤上。烏布利希認為對於斯大林問題，德國統社黨現在無法回答和討論，因為「我們對於斯大林同志的事情並不完全了解」<sup>21</sup>。

同時，烏布利希對黨的宣傳幹部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對《新德意志報》至今沒有對蘇共二十大嚴厲批判教條主義的內容作任何響應表達了不滿。實際上，烏布利希在蘇共二十大後對於教條主義進行批判的態度還算是比較積極的。自從3月4日烏布利希在《新德意志報》上發表評論以來，一些立場保守且毫無思想準備的黨員，對於文章中「斯大林不能被算作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的立場就已經頗有微詞。烏布利希在17日柏林區委代表會議上，對這類固守教條主義的黨員進行了批評。他說：「我們了解，有很多年輕同志是1945年之後參加工人運動的，他們不像我們四十五歲以上的人參加過政黨鬥爭和黨內鬥爭，只是在黨員學習期間背了一些特定的教條，然而他們現在體會到，一些教條與實際生活不相適應。但現在有些人並不將其歸咎於教條主義，反倒是在說實際生活中的一些不是。」<sup>22</sup>

在此可以得出的一個初步結論是，蘇共二十大後，烏布利希對於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問題的響應非常有限。在德國統社黨內，他有意識地把討論焦點從對斯大林錯誤的具體討論，轉移到蘇共二十大決議對今後黨內工作的指導意義，以及對教條主義的批判這類較為抽象的議題上。然而事與願違，烏布利希本人就被視為黨內教條主義的重要代表，一場不利於烏布利希維護他在黨內領導地位的大討論似乎已經難以避免。

## 二 中共八大後烏布利希與毛澤東的共識

無論烏布利希如何努力，都無法抵消蘇共二十大，尤其是秘密報告對德國統社黨的影響和衝擊。其實自1953年以來，部分黨員就已經對烏布利希專斷的領導作風頗為不滿，蘇共二十大的新方針與批判斯大林個人錯誤的秘密報告，促使黨內形成了一股反對烏布利希的「改革派」政治勢力（相對於以烏布利希為首的「保守派」）。特別是在知識份子和青年黨員中，要求烏布利希下台的呼聲更加強烈，在他們眼中，烏布利希就是黨內維繫斯大林模式、主張個人崇拜的代表人物<sup>23</sup>。

在德國統社黨二十六中全會上，以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席維特科夫斯基（Grete Wittkowski）為代表的一批中央委員就提出，要徹底反思政治局與書記處的工作方式<sup>24</sup>。出於對蘇共二十大新精神的尊重，烏布利希無力阻止要求在黨內實行改革的呼聲。1956年4月17日，政治局會議決定改善工作，加強黨內工作的集體領導，對每位政治局成員進行職責分工，同時反對個人崇

拜，對於像領導人看戲這類事情不應予以報導<sup>25</sup>。於是在整個黨內，反思過去錯誤、批判個人崇拜的輿論氛圍便瀰漫開來。

德國統社黨的基層黨員普遍對烏布利希的領導作風感到不滿，對政治局成員的信任逐步喪失，對他們的領導能力愈發表示懷疑，要求公開交流政治見解的呼聲愈發高漲。在黨內高層中，政治局委員厄斯納 (Fred Oelbner) 更是直截批判了烏布利希的官僚作風。7月3日，厄斯納在向政治局遞交的一份聲明中，以特別具有攻擊性的方式痛斥烏布利希的「私人政權」；他表示，「在德國統社黨內存在個人崇拜嗎？是的，存在個人崇拜並且同一個私人政權有關，它主要是由烏布利希同志所行使的」<sup>26</sup>。到了27日召開二十八大全會時，黨中央委員會聯繫對個人崇拜的批判，決定撤銷在1950年代初期所作出的一系列決議，這些決議曾對黨內一些幹部提出了指控，而現在被證明是沒有根據的，一些黨員幹部因此得到平反<sup>27</sup>。與此同時，對於一些問題的爭論持續不斷，主要涉及如何實現黨內民主、為過去錯誤逮捕的黨內同志恢復名譽，以及在各項政治、經濟政策領域內的非斯大林化等<sup>28</sup>。

面對黨內以席爾德萬和厄斯納為代表的「改革派」對自己領導地位的衝擊，烏布利希繼續讓黨員和領導幹部统一思想，鞏固自己在黨內的地位。同時，他也需要獲得外部力量的支持，特別是蘇共二十大後，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思想主張愈來愈受到社會主義陣營內各國共產黨、工人黨的重視<sup>29</sup>。因此對烏布利希來說，除了取得蘇共中央的支持外，獲得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認可也顯得十分重要。

如前所述，烏布利希本人並不完全反對蘇共二十大，他明確要求將蘇共二十大的新方針作為今後德國統社黨工作的指導，也贊成批判固守成規的教條主義。他所反對的僅僅是秘密報告當中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批判，以及由此引申出對他個人在黨內領導地位的挑戰。同樣，毛澤東一開始也並沒有對蘇共二十大持否定態度。蘇共二十大提出的所謂「三和路線」在中共高層中得到了廣泛共鳴，毛澤東內心除了對「和平過渡」的提法不滿外，並沒有其他更為不同的看法，因此中蘇之間並不存在政策性分歧。毛澤東本人對蘇共二十大的非斯大林化也是贊成的，並不反對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只是認為蘇共批判斯大林在原則上和方法上存在嚴重錯誤，並強調對於個人崇拜要有正確的認識，「批判具體的（如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是可以的，但不能在原則上否定個人崇拜」，「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就總體而言，蘇共二十大的路線與中共當時的一些主張並沒有根本性的分歧<sup>30</sup>。

因此，烏布利希與毛澤東對蘇共二十大的立場確有相似之處，即他們都贊成蘇共二十大的新精神，而在批判個人崇拜的問題上則有所保留，但我們並不能就此認為他們反對整個蘇共二十大及其改革方針。更何況秘密報告也並沒有全盤否定斯大林，只是認為「斯大林忠於社會主義事業，但使用了殘酷野蠻的手段」，所以「應該決定一個方針：把斯大林置於應有的位置」；而且赫魯曉夫本人在面對蘇共二十大造成的國內意識形態混亂局面時，也十分仰仗中共的意見與支持，因此很快在意識形態方面就與毛澤東保持一致了。如沈志華所言，隨後召開的中共八大，更是在思想認識、方針政策以及發展路線等各方面，都與蘇共二十大異曲同工<sup>31</sup>。

在毛澤東看來，中共應從蘇共二十大那裏獲得的最重要的教訓是：「要獨立思考，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現在感謝赫魯曉夫揭開了蓋子，我們應該從各方面考慮如何按照中國的情況辦事，不要再像過去那樣迷信了。……現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sup>⑳</sup>如果據此認為這就是中共擺脫蘇共走獨立發展道路的表現，那麼則是大錯特錯了，這恰恰就是蘇共二十大本就想要傳達的反對教條主義、非斯大林化的新精神。此後，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以及中共八大的召開都可以被認作是對蘇共二十大精神的繼承和延續<sup>㉑</sup>。蘇共二十大之後，聯繫實際、走符合自身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成為社會主義陣營內各國的基本共識，各個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採取了程度不同的非斯大林化措施<sup>㉒</sup>。

在民主德國，厄斯納根據蘇共二十大的新精神，修改並再版了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Die Übergangsperiode vom Kapitalismus zum Sozialismus in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一書，指出民主德國在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有着不同於蘇聯的特點，並且刪除了該書第一版當中提出「過渡時期的階級鬥爭必然尖銳化」的觀點。厄斯納特別指出：「由於德國分裂這一事實，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比其他人民共和國有一個較長的過渡時期，各種經濟形式並存的時期也要長些。……正是由於德國被分裂這一事實，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過渡時期經濟措施的執行中，產生了許多重大的困難。」<sup>㉓</sup>

烏布利希本人對於民主德國的這種特殊性有着自己的認識。他在德國統社黨二十一中全會上也同樣表示：「由於我們祖國被分裂，在我們國內就產生了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特殊困難……過渡時期的特點是同時存在各種形式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黨的經濟政策是從這些經濟成份長期並存這一點出發的。」另一方面，烏布利希也同樣強調，「德國民族問題的特點是統一鬥爭與世界兩大經濟體制的競爭相聯繫」。因此，他仍然從與資本主義陣營競爭出發，抱持着加速民主德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願望<sup>㉔</sup>。在這一點上，其實又是同毛澤東不謀而合的。毛澤東提出「以蘇為鑒」的方針，從根本上講，就是不願意再緊跟蘇聯的步驟，而是想要「超到蘇聯的前面去」，用一種「多快好省」的辦法建設社會主義<sup>㉕</sup>。

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一個十分重大的事件。在蘇共二十大精神的影響下，中共八大提出的路線展現出中共領導層少有的冷靜和理性的探索精神<sup>㉖</sup>。烏布利希和席爾德萬一起率領德國統社黨代表團參加了中共八大，在社會主義道路的選擇問題上，他們欣賞並完全贊同毛澤東的意見。9月23日，烏布利希和席爾德萬同毛澤東進行了會談，主要內容涉及到民主德國社會主義道路和東西德關係問題，會談最後他們一致向毛澤東表達了中共八大對德國統社黨所具有的重要指導意義<sup>㉗</sup>：

烏布利希：我們感謝毛澤東同志和政治局的同志。這次黨代會對我們來說非常富有教育意義。它對我們的工作提出了許多建議。我們不僅對經濟上的問題感興趣，也對哲學問題感興趣。

席爾德萬：這是一所學校。

毛澤東：我們的經驗僅供參考。我們的條件不同。以前我們照搬所有的蘇聯經驗。但是這並不適應於我們的具體條件。

烏布利希：我們從一開始就在走另一條道路。

毛澤東：方向是一致的，方式各有不同。民族的形式和一個社會主義的方向。我們都是人，但看上去不完全一樣。比如我們的外貌就有不同。

烏布利希：傳統有不同。

烏布利希在這裏所謂的「另一條道路」，其實就是一條符合民主德國實際的社會主義道路，並且他強調德國統社黨從一開始就在走這條道路。1952年7月，德國統社黨第二屆代表會議決定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基礎，但這個決定引發了社會危機，東德民眾大量出逃西德，進而導致1953年「六一七事件」的爆發，烏布利希的領導地位因此受到了挑戰。雖然他取得蘇共領導層的信任，繼續領導德國統社黨，但1952年方案則被「新方針」所取代。如今他對毛澤東無非是想表達：1952年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決議是正確的，完全契合毛澤東現在所提出的「以蘇為鑒」、獨立自主的精神。同樣，毛澤東對於民主德國反對教條主義的態度也十分關注與讚賞。例如，1956年3月3日，德國統社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哈格爾（Kurt Hager）就民主德國科學、哲學界內存在教條主義的講話中提到，「不能將蘇聯科學界的每句話都認為是神聖的……在哲學上也要重新研究，我們與某些蘇聯哲學家一樣對黑格爾採取完全否定的態度，是錯誤的」。毛澤東見此談話紀要後，要求中共中央宣傳部邀請中國科學院等負責機關同志，討論如何對待蘇聯科學的教條主義態度問題<sup>④</sup>。在與烏布利希等人的會面中，毛澤東依舊批評了過去共產國際和現在共產黨情報局內存在的教條主義，但同時他也十分注意維護蘇聯的領導地位，表示社會主義的「中心是蘇聯。一個人只有一個腦袋。在我們的陣營內，只有一個首領——那就是蘇聯」<sup>④</sup>。

烏布利希和毛澤東對於蘇共二十大後如何繼續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是存在共識的，但並不是像前述哈里森所指出的那樣，他們都持反對蘇共二十大的立場，一起對抗赫魯曉夫的改革政策。兩人所強調的要走結合本國實際的社會主義道路，其實完全契合蘇共二十大的新精神。真正困擾烏布利希的並非蘇共二十大的新方針，而是由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所引起的德國統社黨領導層內部提出的要求加強黨內民主的呼聲。在這方面，毛澤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給烏布利希帶來了很大的困擾。

### 三 「雙百」方針與「波匈事件」的挑戰

應當說，相比於烏布利希，德國統社黨內的「改革派」領導人對於中共在蘇共二十大之後的一系列思想主張以及中共八大的政策更為歡呼雀躍，他們尤其重視毛澤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毛澤東在1956年4月底提出這個口號，並向黨外人士作了宣布，而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在貫徹「雙百」方針的過程中，將其歸結為文化科學工作內的一系列「自由」<sup>④</sup>。當時這個方針在中共

黨內還尚未立即得到積極反饋，但在像波蘭和匈牙利這樣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內，「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得到了當地知識份子和幹部的極大讚賞<sup>43</sup>。

毛澤東的「雙百」方針在民主德國也並沒有立刻獲得明確的響應。當中共八大閉幕，德國統社黨代表團回到國內以後，烏布利希在10月16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建議準備一系列有關中共八大的宣傳計劃，並提交下次政治局會議審議。在這個初步的決定中，並沒有着重提及有關「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內容，倒是特別責成政治局委員昂納克(Erich Honecker)和國防部部長斯多夫(Willi Stoph)商議以怎樣的形式發表中共關於軍隊工作的討論<sup>44</sup>。

然而，「改革派」領導人和民主德國的知識份子不久便對「雙百」方針表現出極高的熱情，比如席爾德萬在為《統一》(*Einheit*)雜誌撰文時，就對中共的這個口號進行解釋：「中共發起的『百花齊放』政策意味着在文學、藝術和科學工作內完全可以有獨立的思想。黨維護意識形態的活動並不是在所有方面對研究活動的自由加以限制，相反，黨給予所有這些活動以充分發展的可能性，並幫助這些領域以一種更好的方式來進行發展。這樣的發展仍舊是在馬列主義思想的指引之下……」席爾德萬無疑是借用毛澤東的「雙百」方針為民主德國各領域內的民主改革搖旗吶喊。這勢必對以烏布利希為首的黨內「保守派」構成挑戰。因此，烏布利希對於「雙百」方針的態度就明顯有所保留，雖然他也承認「百花齊放的口號意味着思想、爭論、批評上的自由，也意味着文學與藝術創作上的自由」，但他同時也強調「這種自由化不同於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自由」<sup>45</sup>。面對黨內、國內早已不絕於耳的自由化呼聲，烏布利希急需穩固他在黨內的領導地位。恰在此時，「波匈事件」爆發，這使得烏布利希的領導地位遭受更大的衝擊。但有趣的是，正是中共對於匈牙利事件的最終表態間接地幫助了烏布利希，使他得以鞏固自己的權力。

「波匈事件」很容易讓烏布利希聯想到1953年發生在民主德國的「六一七事件」，他認為它們都屬於外國「反革命煽動者試圖發動的法西斯政變」。為此，烏布利希命令國家安全部與國家警察作好準備，排查在工廠和農場內可能發生的一切「反革命活動」<sup>46</sup>。波蘭自1956年中爆發騷動，直到10月哥穆爾卡(Władysław Gomułka)當選為波蘭統一工人黨(Polska Zjednoczona Partia Robotnicza)中央第一書記，局勢才趨於穩定。同時，匈牙利國內開始爆發大規模的學生集會，匈牙利事件在10月23日爆發，黨政機關遭到襲擊，匈牙利領導人拉科西(Rákosi Mátyás)被解除職務以求緩和局勢<sup>47</sup>。此時民主德國許多城市的大學，尤其是在東柏林的大學內，一些大學生和教師開始要求黨和政府結束對他們的思想管束，而社會上也出現了同樣的輿論氛圍，並且得到廣泛擴散。德國統社黨的地方領導因日漸喪失群眾基礎而愈發感到沮喪，國家安全部則對於控制高校的形勢感到無能為力。此外，工人不滿於國內惡劣的供應狀況，使得在一些工廠開始發生罷工和抗議事件<sup>48</sup>。

11月6日，烏布利希與民主德國總理格羅提渥(Otto Grotewohl)聯合致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布爾加寧(Николай А. Булганин)以及赫魯曉夫，請求蘇聯援助食品原料以保證民主德國的生活與生產供應，烏布利希本人對於國內形勢感到極為不安，認為當前的形勢極為嚴峻，必須採取緊急措施，避免經濟與政治情況進一步惡化<sup>49</sup>。烏布利希發出這封電報的時機可謂恰到好處。因

為正在前不久的10月31日，面對進一步惡化的匈牙利形勢，蘇共中央主席團決定再次出兵干涉，對匈牙利實行全面佔領。在決策過程中，毛澤東對匈牙利事件的態度，對蘇聯的這次出兵起到決定性的影響<sup>⑤0</sup>。因此似乎可以說，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匈牙利事件的態度轉變，間接地助了烏布利希一臂之力。匈牙利事件自此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被定性為一場「反革命暴亂」<sup>⑤1</sup>，所以此時面對德國統社黨的求援電報，以及面對民主德國爆發類似匈牙利事件的可能，蘇聯領導人便不可能再像「波匈事件」初期對待波蘭、匈牙利那樣等閒視之，也肯定不會再用一種妥協退讓的態度來對待處理。這就意味着蘇共將全力支持烏布利希採取強制措施以穩定民主德國的國內形勢<sup>⑤2</sup>。

11月8日，德國統社黨政治局通過兩天前已經形成的〈關於鎮壓反革命行動的措施〉的決議，決定成立一個由烏布利希任主席的委員會，將工作重點轉向那些危害和破壞工農政權的階級敵人，準備以三個階段的措施來實施鎮壓行動<sup>⑤3</sup>。在獲得莫斯科於物資援助上的允諾後<sup>⑤4</sup>，烏布利希便致力改善民主德國的經濟社會形勢，彌補日常消費品的供應不足，在不減工資的前提下縮短工作時間，提高了對社會弱勢群體的補助金。到了11月中旬，社會上對於官方政策的批評聲音有所減弱，雖然在大學和知識份子群體中依然存在對抗情緒，但是他們與群眾之間缺乏共同利益聯繫的基礎，因此也就難以形成改革合力了<sup>⑤5</sup>。

雖然在穩定政治局勢、避免民主德國也發生類似匈牙利事件這個問題上，德國統社黨政治局內部達成了一致的意見，但是在這之後應該怎樣從匈牙利事件當中吸取經驗教訓，黨內又出現了兩派意見。作為黨內「改革派」的代表，席爾德萬在為11月12日召開的二十九中全會起草的報告中提出，要讓匈牙利事件不在民主德國重演，最好的辦法應當是允許就一切問題進行公開的討論，並且直面這些問題。然而，烏布利希和其他黨內「保守派」批評了這種處理辦法。席爾德萬為自己辯護時稱，他提出這樣的意見是想要保護烏布利希，讓他別走前匈牙利領導人拉科西的老路<sup>⑤6</sup>。

面對黨內「改革派」的挑戰，烏布利希一開始並沒有很好的辦法進行抑制，因為他們所提出的意見符合蘇共二十大的新精神，更以中共八大和毛澤東的「雙百」方針作為他們的旗幟，烏布利希難以與之進行正面抗衡。不過，匈牙利事件的爆發使得蘇共和中共對於東歐的政治形勢判斷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這讓烏布利希有了採取壓制措施的條件，因此通過逐步打擊反對派以鞏固自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

烏布利希首先決定對於社會上的自由化傾向予以嚴厲打擊，在二十九中全會結束後的一個星期，德國統社黨政治局就決定清除所有明顯存在於大學內的挑釁勢力，並且懲罰引起騷動的組織者。11月29日、12月6日，民主德國當局以「建立反國家反革命陰謀組織」的罪名分別逮捕了作家哈里希(Wolfgang Harich)和揚克(Walter Janka)，最終前者被判處入獄十年，後者則被判五年<sup>⑤7</sup>。隨後，烏布利希又在黨內挑起了對國家安全部長沃爾韋伯(Ernst Wollweber)的鬥爭(沃爾韋伯與席爾德萬的關係十分密切)，結果使得國家安全部部長的權力被大大削弱<sup>⑤8</sup>。

1956年底，德國統社黨政治局的內部關係已緊張到極點，以致蘇共中央派遣米高揚訪問東柏林以了解情況。在12月29、30日的德國統社黨政治局會

議上，兩派爆發了激烈的爭論。厄斯納發起了正面進攻，他指責烏布利希是一名主觀主義、傲慢自大、自私自利的第一書記，極度以自我為中心，不接受任何批評意見，還要圍攻每個批評者。席爾德萬則表示，政治局內部的氛圍令人害怕，阻礙了在黨內高層開展務實的批評工作。他和厄斯納都表達了要讓政治局真正實現集體領導的願望，恢復黨中央機關的工作能力；不同於厄斯納關注烏布利希的個人專制以及在其之下領導層的工作方式，席爾德萬更試圖讓自己在未來成為黨的領袖。他們遭到政治局委員馬特恩 (Hermann Matern)、諾曼 (Alfred Neumann)、斯多夫、亞伯特 (Friedrich Ebert) 以及昂納克等人的反對。斯多夫認為，這樣討論黨內領袖的錯誤和不足是完全錯誤的；馬特恩則將這些批評意見上綱為政治觀點上的分歧；亞伯特認為這些有關烏布利希工作方式的討論是帶有私人恩怨的。因此，厄斯納和席爾德萬在政治局內被進一步孤立。1957年1月4日，德國統社黨領導層受邀訪問莫斯科，席爾德萬對烏布利希進行了控訴，卻沒有得到蘇共領導人的支持；雖然莫斯科對烏布利希的政策也有批評，但仍然稱讚他為「堅韌的領導人」、「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優秀戰士」。既然莫斯科態度如此明確，烏布利希便可以放心大膽地接着推動壓制措施，席爾德萬與沃爾韋伯不得不徹底「靠邊站」了<sup>⑤</sup>。

在莫斯科，民主德國政府代表團也正好遇到了同時來訪的中國政府代表團，格羅提渥與周恩來在1月7、8日舉行了兩次會談，結束後雙方發表了一份由民主德國方面起草的會談公報，表明了堅決支持匈牙利卡達爾 (Kádár János) 新政府的立場，並且堅決反對那些旨在顛覆民主德國的活動<sup>⑥</sup>。在1956年底，對於德國統社黨內部的權力格局起着決定性影響的其實還是蘇共，中共則仍扮演外部聲援者的角色，不過毛澤東最終希望蘇聯出兵匈牙利的決定，在客觀上也幫助到烏布利希，讓他有了一個喘息的機會。但是進入1957年後，毛澤東執意要在黨內發動整風運動的主張又對烏布利希造成不小的困擾，為此他需要不斷地與中共進行溝通，從而使雙方消除誤會、達成諒解。

#### 四 誤會的消除：從整風到反右

「波匈事件」的發生使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意識到，要維護國家政權的穩定就需要解決執政黨與人民群眾的關係問題。因此在1956年11月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開始提出準備在黨內開展一場整風運動。到1957年初，毛澤東再次提出要開展整風運動，他的中心思想就是通過擴大民主，貫徹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相互監督」的方針，目標在於克服黨內存在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的作風問題，以化解社會矛盾<sup>⑦</sup>。

此時烏布利希對毛澤東在黨內開展整風運動的想法是較難接受的。在莫斯科，他剛剛獲得了蘇共中央的支持，維護了自己在德國統社黨內的領導地位。回國以後，烏布利希首先要做的就是批判黨內以及民主德國社會內部的自由主義思想觀點，其中自然也包括了一直以來被「改革派」領導人和知識份子所津津樂道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1957年1月30日，在德國統社黨三十中全會上，烏布利希講道<sup>⑧</sup>：

我們不能在反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鬥爭中有絲毫放鬆，也不能容忍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的和平共處。眾所周知，在我們的經濟和文化建設上存在着的一種傾向，以對黨內的「教條主義」開展鬥爭為藉口，容忍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有一些同志……引用了一些在中國報紙上的文章……我們不能簡單地就套用文章中某些適用於中國的公式，並把它搬到民主德國來。在我們這裏，主要不是要讓「百花齊放」，而是要為了那些實際且有益的新選擇去正確地淘汰掉一些花，不能夠容忍胡亂生長的毒草也當作所謂的「香花」。

由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正是毛澤東此時所極力宣揚的思想主張，烏布利希不可能直接地進行正面批判，於是他便祭出「不符合民主德國實際」這樣的話術。同時，他還需要對中共進行解釋，以便消除中國同志可能產生的不滿。

2月28日，民主德國駐華使館的工作人員約見中宣部文藝處處長林默涵，就「雙百」方針進行交流。針對德方人員提出是否認為中共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對所有人民民主國家都普遍適用的問題，林默涵認為「這當然要聯繫每一個國家的具體情況」。隨後，德方人員又表示：各社會主義國家都很關注中共的「百花齊放」政策，這個問題在德國統社黨三十中全會上以及烏布利希的講話中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想請中國同志從他們的立場出發評價烏布利希的講話。林默涵對此的回答是<sup>③</sup>：

德國是一個優秀的國家，它是馬克思主義的故鄉，但也是唯心主義的源頭。因為每個國家的情況各不相同，必須採取符合實際情況的措施。由於民主德國處在一個如此複雜的形勢之下，而且唯心主義還在德國廣泛地傳播着，所以我們認為，當前在民主德國所執行的黨的政策是正確的。我們也同意烏布利希同志的一些觀點。我們同樣反對披着馬克思主義外衣的敵對觀點。此外我們也同樣反對意識形態上的妥協。在中國，將允許唯心主義存在，因為我們認為，人們可以由此開展討論與批判。至於是香花還是毒草的問題，我們認為，所有開放的花都是好花。當所有的花一起開放時，人們必須看一看，其中是否還有毒草。我們認為，也應該讓壞的東西到陽光下來，人們由此可以對其進行批判。我們並不是要向壞的東西妥協。

林默涵的回應反映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百花齊放」的積極心態。從這裏可以發現，此時中德兩黨對於「百花齊放」問題的認識存在着一定的差別。烏布利希認為，資產階級的思想就是「毒草」，不應該讓它們發表出來，而毛澤東則認為，可以讓「毒草」放到陽光下，人們可以對其進行批判。相比較之下，此時的毛澤東比烏布利希更加自信，在他看來，「百花齊放」會讓資產階級思想多起來，但資產階級思想並不是一無是處，讓許多資產階級思想暴露出來是好事，才有機會讓人對他們進行教育。所以當時毛澤東才會說：「現在不是放多了，是少了，應該再放。當然在放之中任何錯誤的東西都應該批評。現

在放夠了嗎？鳴夠了嗎？不夠的。」<sup>64</sup>對此，民主德國駐華使館的工作人員再次解釋道：烏布利希的講話是與民主德國的具體情況相適應的，應當阻止敵對份子在「百花齊放」口號的外衣下公開宣傳反革命和修正主義的觀點，但德國統社黨贊成在所有領域開展學術觀點上的爭論<sup>65</sup>。

3月7日，民主德國駐華大使居普特納(Richard Gyptner)再次約見中國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副司長陳伯清討論有關「雙百」方針的問題。居普特納表示，烏布利希在三十中全會上的講話提出，首先不是要「百花齊放」，而是要進行正確的選擇與淘汰。有些人表面上接受中國的宣傳口號，然後想要發表破壞民主德國國家秩序的敵對言論，這些就是修正主義的毒草，必須同它們進行最嚴厲的鬥爭。陳伯清表示，烏布利希的觀點是正確的，符合民主德國的複雜形勢。但他補充說明，這個宣傳口號是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具體化，「因此我們的原則是，讓毒草長出來，因為它們在世界上出來一次後，人們就不會再不予以重視了」。對此，居普特納問哪些可以算作是「毒草」？陳伯清回答：「應該理解為是這樣一些人，他們的觀點和思想都是不正確的，這與哪些觀點是正確的，哪些觀點是不正確的有關。但敵對的反革命觀點則屬另外一個範疇。對待敵對反革命的觀點只能進行生死鬥爭。這些敵人是革命的對象，在這一點上，中國和民主德國的立場是一致的。但這一問題與觀點或意識形態的正確與否沒有關係。」<sup>66</sup>

從陳伯清的表述中可以發現，中德雙方的分歧主要集中於如何對「毒草」概念進行定義。在毛澤東看來，「毒草」可以算作是人民內部矛盾，在「鳴放」的過程中，如果能夠被暴露出來則是件好事，能讓人民得到清楚的認識，並且通過批評教育來克服它們。在烏布利希看來，「毒草」就是敵對的、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的壞東西，要堅決扼殺之。因此對於中共「百花齊放」的口號，烏布利希堅持認為這只是「為中國的情況而特別提出的，生搬硬套會犯嚴重的政治錯誤」<sup>67</sup>。當然，中共也並沒有刻意地想將整風向其他兄弟黨強行推廣，自然也贊同烏布利希的觀點，承認民主德國有着自己的特殊性。

然而在5月中旬，毛澤東開始感到「事情正在起變化」，擔心在中國也有爆發匈牙利事件的可能，於是他從5月中下旬開始決定「引蛇出洞」，到6月初開始全面反擊「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sup>68</sup>。在此之前，德國統社黨「保守派」領導人總是在擔心「百花齊放」會導致中共政策的右傾，直到此時他們才恍然大悟，發現自己過去可能是「誤會」了中共與毛澤東的意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原來只是一個為了更好地與階級敵人開展鬥爭的「陽謀」而已<sup>69</sup>。

10月2日，毛澤東會見斯多夫率領的軍事代表團，他表示，在中國大概有1,200萬人，他們堅決反對社會主義，想搞資本主義復辟，「我們正在批評他們，進行思想教育。這便是整風和反右派，劃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界線」，「在匈牙利和其他國家，誰戰勝誰的問題尚未最後解決，中國也屬這類國家，我們這些國家都要很注意這個問題，不要認為已勝利了，其實還沒有最後勝利」<sup>70</sup>。言下之意就是中國和民主德國一樣，不能認為無產階級已經取得了勝利，事實上，同資產階級的鬥爭形勢仍然十分嚴峻。對於毛澤東這樣的表態，烏布利希自然舉雙手贊成。此後，彭德懷在1959年率領中國軍事

代表團訪問民主德國時也向烏布利希表示，德國統社黨當時沒有接受中國的「百花齊放」政策是完全正確的。在5月5日與烏布利希的會談中，彭德懷提到：「百花齊放，大鳴大放，在中國能搞，……在民主德國就不一定能搞，因情況不同，……在民主德國只許烏布利希同志一家獨鳴。德國同志當時沒有受我們提出『百花齊放政策』的影響，這是對的。」<sup>①</sup>

中國開展反右運動，客觀上為烏布利希提供了有利條件，使他可以更加順理成章地打擊黨內那些反對他的人。1957年12月中旬，烏布利希抓住了一次偶然的事件，把它作為有人在黨內進行宗派活動的有力證據：民主德國在卡爾·馬克思城(Karl-Marx-Stadt，今開姆尼茲[Chemnitz])召開了「蘇德聯合鉍金屬股份公司」董事會會議；當晚正式會議結束後，在蘇德兩國董事會成員非正式的社交聚會上，中央書記處書記齊勒(Gerhard Ziller)在酗酒後公開大聲指責烏布利希，表達自己對他的不滿，並且表示要在下一次中央全會上同厄斯納、席爾德萬、國家工業交通委員會主席澤爾布曼(Erich Selbmann)以及維特科夫斯基一起，與烏布利希展開激烈辯論。在1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烏布利希開始藉此向黨內「改革派」成員發動政治進攻，對涉及此事的人員進行嚴厲的審問，「改革派」對此則毫無招架之力；而齊勒於14日晚自殺身亡<sup>②</sup>。在1958年2月的三十五中全會上，昂納克宣讀了政治局決議，認定席爾德萬、厄斯納、齊勒、澤爾布曼、維特科夫斯基等人兩年來在黨內組織宗派活動，反對黨的領導決議。結果席爾德萬被開除出中央委員會，厄斯納被解除政治局委員的職務，沃爾韋伯也因試圖排拒烏布利希對國家安全部的直接領導而被開除出中央委員會。中共對於烏布利希的這一系列措施都表示支持，認為這些人就「等於中國的右派」<sup>③</sup>。

至此，德國統社黨內積極響應蘇共二十大新方針以及毛澤東「雙百」方針的「改革派」勢力，最終在政治上被烏布利希徹底擊垮。客觀上，烏布利希抓住蘇聯對匈牙利事件的態度轉變以及毛澤東決定從整風轉向反右的兩個有利時機，鞏固了他個人在黨內的領導地位，使之變得難以動搖。可以說，反右運動的開展消除了烏布利希對毛澤東「百花齊放」的「誤會」。從此之後，德國統社黨與中共在意識形態上的某些共性就被更加凸顯出來。

## 五 簡短的結論

1960年代初，西方的觀察家似乎發覺，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中國與民主德國的關係已經變得親密無間，他們甚至開始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社會主義陣營內部是否存在着一個「北京—潘科夫軸心」(Peking-Pankow Axis)<sup>④</sup>？這證明從旁觀者的眼光來看，當時中德兩黨之間的關係顯得非常親密與特殊。且不論這種關係是否真的存在過，即便存在，那也至少要等到1957年中以後，而絕不是從蘇共二十大之後開始的。也就是說，中德兩黨並不以共同反對蘇共二十大作為它們親密關係的基礎，同時也並沒有展現出某種挑戰蘇共領導地位的「特立獨行」。事實上，蘇共二十大之後，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思想主張對德國統社黨的影響經歷了一個複雜的變化過程。

如何認識蘇共二十大之後中共對於德國統社黨的影響作用？可以說是既重要又有限。蘇共二十大之後，由於赫魯曉夫揭露了斯大林的種種錯誤，加上「波匈事件」等問題，使得蘇共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威信大大降低，動搖了蘇共的領導地位<sup>⑤</sup>。此時，各國的共產黨和工人黨自然更加希望了解緊隨蘇共之後的中共以及毛澤東的聲音，中共在這一時期對於國際共運的見解無疑是權威的。對於德國統社黨的領導人而言，他們都需要從中共的權威聲音中找到符合本國實際的那一部分，以此來論證自己的正確性與合理性，因此就可以發現作為「保守派」的烏布利希與作為「改革派」的席爾德萬對於中共的主張各有自己所想要突出強調的部分。而對烏布利希來說，他更多要做的是消除毛澤東「雙百」方針對其個人領導地位的消極影響。

### 註釋

①⑤ 沈志華：〈蘇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對中蘇關係的影響〉，載《冷戰中的盟友：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國家關係》（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頁114-19；139。

②⑩⑪ 參見沈志華：《無奈的選擇：冷戰與中蘇同盟的命運（1945-1959）》，上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頁355-415；372-76、382-98；406-407。

③④⑤ Nicole Stuber, "East German China Policy in the Face of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1956-1966", Ph.D. diss. (Université de Genève, 2004), 83; 72.

④⑩⑪⑫⑬ Hope M. Harrison, *Driving the Soviets up the Wall: Soviet-East German Relation, 1953-1961*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78; 66; 218-19, n. 90; 82.

⑥ Hope M. Harrison, *Driving the Soviets up the Wall*, 67-68; Gerhard Wettig, *Sowjetische Deutschland-Politik 1953 bis 1958: Korrekturen an Stalins Erbe, Chruschtschows Aufstieg und der Weg zum Berlin-Ultimatum* (München: Oldenbourg Wissenschaftsverlag, 2011), 67-68.

⑦ 席爾德萬於1956年2月26日早餐時向烏布利希詢問，在向於蘇聯黨校學習的民主德國學生的講話中，應該就有關赫魯曉夫秘密報告說些甚麼？烏布利希表示：「你可以明確地說，斯大林並不是一位經典作家。」席爾德萬認為，烏布利希的這種應對方式是把深刻問題極度簡單化。參見Hope M. Harrison, *Driving the Soviets up the Wall*, 258-59, n. 84。

⑧ 德國統社黨的代表會議 (Parteikonferenz) 不同於代表大會 (Parteitag)，代表會議一般在兩屆代表大會之間舉行。歷史上，德國統社黨共召開過三屆代表會議，時間分別為1949年1月25至28日、1952年7月9至12日、1956年3月30日至4月6日。

⑨ "Protokoll Nr. 7/56 der außerordentlichen Sitzung des Politbüros des Zentralkomitees am 29 Februar 1956 im Amtssitz des Genossen Pieck", Stiftung Archiv der Parteien und Massenorganisationen der DDR im Bundesarchiv (SAPMO-BArch), DY 30/J IV 2/2/461, Bl. 1.

⑩ Hope M. Harrison, *Driving the Soviets up the Wall*, 67; Andreas Malycha and Peter J. Winters, *Die SED: Geschichte einer deutschen Partei* (München: C. H. Beck, 2009), 127; Dietrich Staritz, *Geschichte der DDR*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6), 147.

⑪ "Stimmung zur Veröffentlichung des Genossen Walter Ulbricht über den XX. Parteitag" (6 März 1956), Bundesbeauftragter für die Stasi-Unterlagen (BStU), 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 (MfS), AS 89/59, Bl. 139-42.

⑫ "Betr.: Einberufung der Tagung des Zentralkomitees" (7 März 1956), SAPMO-BArch, DY 30/3289, Bl. 23-24.

- ⑭ “Genossen Staatssekretär Otto Winzer” (8 März 1956), SAPMO-BArch, DY 30/3289, Bl. 25-26.
- ⑮ “An die Mitglieder und Kandidaten des Politbüros” (10 März 1956), SAPMO-BArch, DY 30/3289, Bl. 22.
- ⑯ “Telegramm an das Präsidium des Zentrelkomitees der KPdSU Genossen N. S. Chruschtschow” (19 März 1956), SAPMO-BArch, DY 30/3532, Bl. 4.
- ⑰ 從1950年7月德國統社黨三大閉幕到1958年6月為止，一共召開過三十六次中央全會，並以此作連續計數，其間經歷了兩次代表會議和一次代表大會。
- ⑱ Hope M. Harrison, *Driving the Soviets up the Wall*, 67. 對於秘密報告，莫斯科一開始希望能對國外最大限度地保密，但這個界限很快取消了。1956年3月24日，蘇共中央聯絡部建議，各人民民主國家可以向黨團中央及各地區部門主管幹部介紹秘密報告。28日，聯絡部又建議向在蘇聯學習和工作的各兄弟黨黨員和預備黨員宣講秘密報告。當天，《真理報》發表了編輯文章〈為甚麼個人崇拜是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精神的〉，第一次正式地指出「所謂批判個人崇拜，就是批判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參見沈志華：《無奈的選擇》，上冊，頁377；〈為甚麼個人崇拜是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精神的〉，《人民日報》，1956年3月30日，第3版。蘇共這一系列決定，是否與烏布利希3月19日致赫魯曉夫電報之間存在直接關聯，仍有待核實；但從時間上看，烏布利希確實先於24日蘇共中央聯絡部建議，向德國統社黨中央委員介紹了秘密報告的內容。
- ⑲ 1956年2月16日，米高揚率先在蘇共二十大上的發言中點名批評了斯大林，認為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分析資本主義經濟情況的一些論點，「未必能對我們有所幫助，未必是正確的」。這引來了不少與會者的反對，認為米高揚的講話是對斯大林光輝形象的一種褻瀆。客觀上，米高揚的講話為後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作了火力偵察。參見〈米高揚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人民日報》，1956年2月22日，第5版；徐元宮：〈赫魯曉夫「秘密報告」若干問題考證〉，《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11年第1期，頁26-27。
- ⑳ “Berichterstattung von Walter Ulbricht auf der 26 Tagung des SED-Zentralkomitees am 22 März 1956 (Auszug)”, in *Die SED. Geschichte. Organisation, Politik: Ein Handbuch*, ed. Andreas Herbst, Gerd-Rüdiger Stephan, and Jürgen Winkler (Berlin: Dietz, 1997), 629-34.
- ㉑ Dietrich Staritz, *Geschichte der DDR*, 147.
- ㉒⑳ Bernd Schaefer, “The GDR, the FRG and the Polish October 1956”, in *The Polish October 1956 in World Politics*, ed. Jan Rowiński (Warsaw: Pol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7), 200; 201.
- ㉓ 面對維特科夫斯基等人質疑為甚麼政治局向中央委員隱瞞了秘密報告內容，烏布利希在1956年3月22日的講話中仍試圖進行解釋：「我們沒有得到可以傳達的許可……這絕不意味着輕視中央委員會，絕對不是。」參見Andreas Malycha and Peter J. Winters, *Die SED: Geschichte einer deutschen Partei*, 139; “Berichterstattung von Walter Ulbricht auf der 26 Tagung des SED-Zentralkomitees am 22 März 1956 (Auszug)”, 631。
- ㉔ “Verbesserung der Arbeit des Politbüros”, SAPMO-BArch, DY 30/J IV 2/2/472, Bl. 9-12.
- ㉕⑳⑳ Andreas Malycha and Peter J. Winters, *Die SED: Geschichte einer deutschen Partei*, 139; 140-41; 141-42.
- ㉖ 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馬列主義研究所編寫組編，陸仁譯：《德國統一社會黨簡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頁389。
- ㉗⑳ 沈志華：《無奈的選擇》，下冊，頁424-25；425、428。
- ㉘ 沈志華：《無奈的選擇》，上冊，頁395-97；〈蘇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對中蘇關係的影響〉，頁148、151。
- ㉙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頁557。
- ㉚ 參見毛澤東：〈論十大關係〉（1956年4月25日），《人民日報》，1976年12月26日，第1-4版。

③④ 參見Csaba Békés, Malcolm Byrne, and János M. Rainer, eds.,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A History in Documents*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2), 10-11; 孔寒冰：《東歐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頁358、374-75。

③⑤ 厄斯納(Fred Oelßner)著，張載揚、孫懷萱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北京：三聯書店，1957)，〈第二版前言〉，頁16-17。

③⑥ 厄斯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頁16；Hope M. Harrison, *Driving the Soviets up the Wall*, 74。

③⑦③⑧③⑨ 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運動(1956-1957)》(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9)，頁303；461-522；477；523-647。

③⑩⑪ “Aufzeichnungen über eine Unterredung zwischen den Genossen Mao Tse-tung, Liu Schao-tschi und Wang Tschia-hsiang (Leiter der Abt. Außenpolitik im ZK der KP China) mit der Delegation des ZK der SED, die am VIII. Parteitag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Chinas teilnahm”, in *Die DDR und China 1949 bis 1990: Politik-Wirtschaft-Kultur; eine Quellensammlung*, ed. Werner Meißner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5), 90.

③⑫ 〈關於請中宣部討論對待蘇聯科學的教條主義態度問題的批語〉(1956年4月18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74-75。

③⑬ 參見沈志華：《思考與選擇》，頁214-32；陳清泉、宋廣渭：《陸定一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頁413-30。

③⑭ 但在之後幾次政治局會議的記錄內，並沒有反映出對中共八大宣傳計劃的討論，從10月19日起德國統社黨一連召開了四次政治局特別會議，此時「波匈事件」已經成為政治局所關心的核心問題。參見“Protokoll Nr. 50/56 der Sitzung des Politbüros des Zentralkomitees am 19 Oktober 1956 von 12.00-14.30 Uhr im Zentralhaus der Einheit, Großer Sitzungssaal”, SAPMO-BArch, DY 30/J IV 2/2/504, Bl. 1-3。

③⑮ 參見劉曉：《出使蘇聯八年》(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8)，頁28-35。

③⑯⑰⑱ Gerhard Wettig, *Sowjetische Deutschland-Politik 1953 bis 1958*, 69-70; 71-72; 73.

③⑲ “Protokoll Nr. 56/56 vom 6 November 1956”, SAPMO-BArch, DY 30/J IV 2/2/510, Bl. 6-7.

③⑳㉑ 沈志華：〈中蘇蜜月的最後時刻：毛澤東、赫魯曉夫與1957年莫斯科會議的召開〉，《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7年6月號，頁73；76。

③㉒ 劉曉：《出使蘇聯八年》，頁37；Gerhard Wettig, *Sowjetische Deutschland-Politik 1953 bis 1958*, 70。

③㉓ Gerhard Wettig, *Sowjetische Deutschland-Politik 1953 bis 1958*, 70. 而作為東歐局勢的旁觀者，美國中央情報局(CIA)也認為，即便在蘇聯衛星國普遍出現反蘇、反共情緒的惡劣情況下，民主德國之於蘇聯將會是個特例，因為「不論東德人懷有怎樣的願望，幾乎可以肯定的是，蘇聯不會允許自己對東德的控制受到任何嚴重的削弱，也不會允許民族主義對東德政府產生任何實質性影響。在蘇聯看來，東德對其自身安全至關重要」。從這一角度出發，蘇聯也必定會支持烏布利希採取強制措施來穩定形勢。參見〈東歐局勢的可能走向及其對蘇聯政策的意義〉(1956年10月30日)，載郭潔：《匈牙利事件：美國的政策與反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頁203-205。

③㉔ “Beschuß des Politbüros, Betr.: Maßnahmen zur Unterdrückung konterrevolutionärer Aktionen” (6 November 1956), SAPMO-BArch, DY 30/J IV 2/2/511, Bl. 8-9.

③㉕ 根據中國駐蘇聯使館的了解，蘇聯對民主德國的援助體現在：將過去由民主德國負擔開採鉍礦50%的費用，改為全部由蘇聯負擔，將蘇聯駐德軍隊的費用(以馬克計算)由德方負擔的75%減為50%，並將1956年供給民主德國的黃金增

加至75噸(1955年為35噸)，以便民主德國購買資本主義國家的貨物。參見〈蘇歐司為總理訪蘇準備的有關蘇聯情況的材料(節錄)〉(1956年12月24日)，載沈志華：《冷戰中的盟友》，頁533。

⑤⑦ Hope M. Harrison, *Driving the Soviets up the Wall*, 85; Bernd Schaefer, "The GDR, the FRG and the Polish October 1956", 203.

⑥⑩ 劉曉：《出使蘇聯八年》，頁37-3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5；〈中德兩國政府代表團發表會談公報〉，《人民日報》，1957年1月10日，第1版。從事後來看，格羅提渥與烏布利希對於同周恩來的會談所達成的這樣一個公報似乎並不滿足，他們在返回東柏林的途中就批評了外交部的工作，認為他們在與中國政府代表團的會談上並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參見Dierk Hoffmann, *Otto Grotewohl (1894-1964):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München: De Gruyter Oldenbourg, 2009), 637。

⑥⑫ "Stenographische Niederschrift der 30 Tagung des Zentralkomitees der SED im Amtssitz des Präsidenten der DDR in Berlin-Niederschönhausen, vom 30.1 bis 1.2.1957", in *Die DDR und China 1949 bis 1990*, 93.

⑥⑬⑭ "Aktenvermerk über eine Unterredung mit dem Leiter der Abteilung Literatur und Kunst in der Propaganda-Abteilung des ZK der KP Chinas, Lin Mo-han, über die Politik 'Mögen alle Blumen Gemeinsam Blühen und Alle Gelehrten Miteinander Streiten' am 28 Februar 1957 in der Zeit von 10.00 bis 12.00 Uhr im Gebäude der Propaganda-Abteilung des Zentralkomitees" (5 März 1957), in *Die DDR und China 1949 bis 1990*, 95-96; 96.

⑥⑮ "Aktenvermerk über eine Unterredung im MfAA der VRCh am 7.3.1957 in der Zeit von 13.30 bis 14.30 Uhr, zwischen dem stellvertretenden HA-Leiter, Tschchen Bo-tjin und dem Unterzeichneten. An der Unterredung nahmen teil: Attaché G. Kahlenbach und als Dolmetscher Gen. Dshou vom MfAA" (8 März 1957), in *Die DDR und China 1949 bis 1990*, 97-98.

⑥⑯ "Bericht über innenpolitische Entwicklung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seit dem VIII. Parteitag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Chinas" (4 April 1957), SAPMO-BArch, DY 30/IV 2/20/120, Bl. 47.

⑥⑰ Helmut Liebermann, "Vom Dolmetscher zum Botschafter", in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Beziehungen der DDR und der VR China: Erinnerungen und Untersuchungen*, ed. Joachim Kürger (Münster: Lit Verlag, 2002), 11.

⑦⑩ 〈毛澤東主席會見民主德國軍事代表團談話記錄〉(1957年10月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1102-04，頁67-68。

⑦⑪ 參見〈駐德使館致外交部、國防部並報黨中央、國務院：烏布利希接見彭總談話記要〉(1959年5月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館，110-00846-06，頁88。

⑦⑫ Andreas Malycha and Peter J. Winters, *Die SED: Geschichte einer deutschen Partei*, 143-44; "Protokoll Nr. 51/57 der außerordentlichen Sitzung des Politbüros des Zentralkomitees am Freitag, dem 13 Dezember und am Sonnabend, dem 14 Dezember 1957", SAPMO-BArch, DY 30/J IV 2/2/571, Bl. 1-2.

⑦⑬ Andreas Malycha and Peter J. Winters, *Die SED: Geschichte einer deutschen Partei*, 144；《德國統一社會黨簡史》，頁404-405。有關中共對德國統社黨三十五中全會這一系列決定的態度，陳毅在1958年2月13日與居普特納的會談過程中曾表示：「我從報紙上看到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開除幾個人的消息。這些人不好，他們回應西方，在社會主義國家中進行破壞，等於中國的右派。黨的這個措施是正確的。」參見〈周恩來、陳毅接見民主德國紀普納大使談話記要〉(1958年2月1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館，109-00841-03，頁6。

⑦⑭ M. J. Esslin, "East Germany: Peking-Pankow Axis?", *China Quarterly*, no. 3 (September 1960): 85-88. 潘科夫(Pankow)是柏林市東北部的一個行政區，是當時許多民主德國政府官員所居住的區域，西方經常以此來指代德國統社黨政權。